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九十一）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五〇期 ——
（二〇〇一年二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0 2 b）

【史海钩沉】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 ——从“6. 18”事件到“7. 29”大会 《炮打司令部》不是一张大字报	李雪峰 邱 时
【亡灵祭坛】文革受难者沙坪 忠烈失骨骼，张志新魂归何处	王友琴 郑兢业
【研究动态】在美国听“文化大革命”课	李向前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史海钩沉】

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
——从“6. 18”事件到“7. 29”大会
• 李雪峰 •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任命我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第二书记，组成新市委。《人民日报》1966年6月4日公布了这一任命。从此我被深深地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中。

虽然当时我们对许多事情不能理解，但还是遵循着党内一贯的老传统，忠实地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各项决定。从我到北京市工作至我被罢官前后两个月时间，毛主席说我犯了50天的路线错误。在此期间中央日常工作一度由少奇和小平同志主持。那时中央大多数负责同志对突如其来的混乱局势都主张要采取措施加以稳定。北京市首当其冲，向各大专院校派去工作组，市委因此被定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这个时期，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少数人外，中央的负责同志并不了解毛主席的意图，因而只是按照北京市的状况指导工作，力求稳定大局，把运动引导到党的领导之下。我所犯的所谓50天的路线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波澜，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蕴育之中。

一、刘少奇“6.20”批示

6月1日以后，北京的大字报多极了，铺天盖地。我们没有时间看，让秘书分头去看，他们也看不过来，也看不完。我们完全是仓促上阵，对聂元梓反对彭真的由来不甚了了，对北京各大学、中学的情况也不甚了解。当时中央已对彭真的问题定了性，彭真、刘仁同志都住在家里，已停止工作。在中央讨论北京市委书记处名单时，我对彭、刘既没有讲好话，也没有讲坏话。中央决定在北京新市委中保留原来的三位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

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错误的舆论，意思是新市委领导属于“保皇派”，说我们放手不够，因而北京市“保皇派”的势力很大，大字报中“保”的内容多。我向中央汇报是如实汇报客观情况。当时大字报的内容确实不像后来那么上纲上线，因为共产党17年来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得到群众的拥护，很多群众对“文革”不理解，因此“揭露”性的大字报较少。但是毛主席却认定以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派我去的任务是揭开盖子，反“旧市委”。我们也只能照此对前市委，特别是市委主要领导进行批判。成立新市委，群众敲锣打鼓欢迎，庆祝。但我心里明白，我想党中央在考验我能否执行中央方针，能否打开局面。我不了解情况，对许多问题不理解，看到形势的发展是跳动的，根本跟不上。

为什么叫“旧市委”？因为《人民日报》公布成立新市委，因而人们称原来的市委为“旧市委”。这种说法如同叫国民党的政权为旧政权一样，因此原市委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对此很有意见。

中央每次开会都是要求放手、更放手。我们在华北局也是这样传达、布置。会上“保守”的倾向比较大，怎么突破这一关？怎么跟得上毛主席对聂元梓大字报的评价？大家共同点，都认为毛主席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比历次运动都猛。安子文讲：“三反”就很厉害，那时毛主席在怀仁堂讲，“国共合作，现在是真正的国共合作”（他的意思是指共产党向国民党学习腐化）。当时限期两天之内发动群众，如发动不起来统统撤职。什么叫发动群众？就是让群众骂你。安子文说，那时，只怕人家不骂你。这实际是为保官而斗争。第一炮打官僚主义，炮打司令部，朝我来。有男女关系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或者用私人、家属来了找工作等等，从小事开始。经历了这么多次运动，但是大家谁也没有想到“文革”来得这么猛。

放手发动群众，放手也不容易。怎么个放法？放给谁？谁是群众？只能一步一步做。很难，很难。

6月1日到10日是宣传阶段。10日参加杭州会议回来之后觉得，毛主席虽然态度不那么明确，中央也不那么痛快，但是胆子要大，还是要干嘛！每天做说服工作：不要怕，准备垮台。王任重当时主持中南局的工作，他的思想和我们一样，但是他离中央远，又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并曾提议起草《五一六通知》，因而到12月份才垮台，被解除工作。

6月3日上午11时，中央在少奇同志家开会。少奇主持，小平讲话，总理在，参加会议的有陈毅（外交口）、薄一波（工交口）、李先念（财贸口）、陶鲁笏（农村口）、叶剑英、陈伯达、康生、汪东兴、陶铸，我和郭影秋代表北京市参加。大家在会上说，现在搞运动总得有个办法。大家议论了七条，我建议再加一条群众路线。小平首先表示：好，同意。

讨论完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大。因为要传达，中央又没有指示，我就从头

念了一遍，大家都同意。陈毅讲了一段话，他表示很高兴，对我说：你再说一遍。他拿出小本子记。当时他也很紧张，外办、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

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3．游行不要上街；4．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6．注意保密；7．不准打人、污蔑人；8．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制定出八条之后，我说：“有了这八条就好办了，现在需要向下讲。”

小平说：“开个十万人大会，一杆子插到底，新市委上任。”

我说：“还得准备，先分开讲。今天晚上开第一次会，包括机关干部；第二次包括学校，分开讲。工作几天再看看情况。”

他说：“好。”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6月6日北京新市委宣布成立新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6月15日，北京新市委和共青团中央决定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6月18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决定。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的消息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这篇社论无疑给北大的学生点了一把火，因为学生们认为陆平的问题比匡亚明大得多，而且是中央点了名的，但是至今未被斗争过。由于陆平等领导被工作组隔离，他们找不到，于是他们就斗那些能找到的人。

6月18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全体工作队队员都到教学区开会，学生们独自在学生宿舍区学习、开会。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的学生利用工作组不在期间，在学生宿舍区先后斗了40多名正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教师、党员干部和两名学生干部（其中一名是西语系学生团支部书记吴然，他是烈士子弟、原市委大学部部长吴子牧的养子）。以一、二年级的学生为主，在39楼设了“斗鬼台”，将墨汁倒在被斗人的脸上，拿厕所的纸篓作成高帽子戴在被斗人头上，罚跪，少数人还扭打被斗者。事件发生后，其他同学赶快报告工作组，有的高年级的同学挺身而出制止：“说理斗争不要打人”。工作组领导小组张承先等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闻讯后赶赴现场，讲话制止。11时以后，情况缓和下来。

工作组认为，这次事件的发生“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针对上述情况，领导小组立即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

下午1时召开各系工作组组长紧急会议，分析了上午的事件，提出这次事件与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同（聂元梓大字报公布之后，北大校园即出现过打人的现象），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此决定抓住这件事，教育群众，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辨明是非，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增强革命警惕性。以系为单位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揭露今天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号召大家提高警惕，严防坏人破坏。会后即分组讨论，要求19、20、21日连续3天组织讨论、对照、检讨。

当晚10时，工作组主持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由张承先广播讲话，主要讲了工作组要坚决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同时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

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批评了乱批、乱斗干部的做法是违反党的政策，指出这种做法会被而且已被坏人利用，揭露了当场被抓住的几个坏人的情况。并要求全体师生员工组织讨论。工作组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讨论、批准，等等。

当夜北大工作组给中央写了简报，即《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简报报告了事件的经过和他们处理的情况。报告认为：“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并说：“除了这些坏人以外，参加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本身有问题的人，怕火烧到自己身上，乘机表现自己，假装积极，抓‘替死鬼’，乱打乱斗；另一种人还是单纯从个人出气出发，不听工作组的劝告，不顾党的政策，不顾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利益。”并报告了他们已采取的四项措施。当天张承先向我汇报了情况，我也同意上述简报的内容。

6月19日少奇以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份简报，加上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这个简报于20日下发。刘少奇认为牛鬼蛇神出动了，和毛主席的看法有分歧。

当时，我们处理的事情太多，隔了一两天，大约是21日、22日我看到刘少奇对北大工作组简报的批示，才知道中央转发了这份简报。当然，我们贯彻了中央的指示，6月下旬，让北大以及工交系统的工作组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经验。我们派马力（新市委秘书长）到清华去看蒯大富，那时清华工作组正在斗蒯大富。

二、我的6月23日讲话

6月23日我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市委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毛主席讲过“一个游鱼三个浪”的话。我解释：不要把这件事（指“6.18”事件）看得那么重，但大体还是按照刘少奇意见讲的，只是把语气变了一下。说：现在形势大好，“各校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出台了。”反革命拦腰一截，把我们的运动截了一下。有反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抓起来不就完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否则纳吉要上台。”由此而来的是下面运动中开始“抓游鱼”。当时讲话时，还以为这是发动群众的一种办法。

在6月23日讲话中，我还提出恢复党团组织活动，因为我认为北京市的党员、团员，党组织、团组织，大多数是好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的。有的过去就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进行过抵制和斗争；有的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是在“三家村”和它的根子被揭露以后，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投入了战斗；有的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他们在党和群众的教育、帮助下，许多人正在同错误彻底决裂，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们的共青团是党的忠实的得力助手。我们的党员、团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是革命的。6月30日《北京日报》根据我讲话的精神发表了社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站在革命斗争最前列》。

后来批斗我，给我罗织的两大罪状，第一是参与制定“八条”，第二即是“6.23”讲话，“抓游鱼”。

运动来得猛，情况复杂。我们难以了解全面情况，又没有思想准备，就是每天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一天累得要命。但6月份对我的冲击还不大。机关里的大字报渐渐多了，我也没有多看，因为实在顾不上。后来这也是一条罪状：不看大字报，不上“前线”。

新市委成立之初，有同志提出，北京市郊区“四清”搞得不彻底，需要总结经验，秋后进行“四清”复查。于是集中了8000名农村“四清”工作队队员召开北京市“四清”干部会议，会址在西苑旅社。会议一开始，几个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头头就派人到队员驻地串联、煽风点火，要求揪斗“四清”工作团的领导干部，即原各区县局领导同志。他们指责和批判“四清”干部会的领导小组同志，说会议开得冷冷清清，不批不斗，包庇黑帮，镇压群众。在此情况下，会议无法进行，我们商量后经市委批准，宣布散会。但少数人不走，坚持说散会是个大阴谋，他们的活动得到当时《红旗》杂志社及中央文革的支持。时隔不久，大约是6月份，8000人又复会，住在市委党校。会议变了性质，集中批斗“四清”干部会的领导小组成员，同时我也成为被批判者之一。造反派批判我们开的“四清”干部会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黑帮、镇压革命群众。为此我后来作过多次检讨。事后查明，复会以后中央文革有联络员在会上支持批判我们的那一派。这样会上逐步形成两派，有一派是保我们的，力量很小。复会搞了几个月，散会后，有些造反派头头回到各区县又搞武斗，搞打砸抢。

三、陈伯达发牢骚，康生发脾气

7月15日，康生、陈伯达在一次会上闹了一场。

康生给我讲，他们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北大，要开一个会听听汇报。我说：我们也派了一个工作组（实际上是指我的秘书们）。是否两个工作组一起汇报？他同意了。7月15日，康生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和市委书记处联席会议，听上述两个工作组汇报。但由于陈伯达发牢骚、康生发脾气，两个工作组谁也没有汇报成。

会议刚开始，陈伯达就站起来，大发牢骚：“我是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政研室人少，人家看不起，没有人找我们。人微言轻，我讲话人家不听。我要到天津去。”他还要我向陶铸转达他去天津的要求。我一听，这不是批评我们吗？

陈伯达还没讲完，关锋就接上去讲了一大段，意思是你们都给刘、邓汇报，不给我们讲。他讲得系统，口气挺凶，表示十分不满。

康生在这次会上也发了一通脾气。他主要谈了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问题。他很不满意地说，他说话、文革小组的人说话不算数，没有人听，等等。市委分工吴德负责北师大。不知康生发这个脾气有什么由来。

中央文革这么一闹，工作组没法汇报了。原定的日程全打乱了，还把我们批了一顿。我很生气。

四、怀仁堂会议

怀仁堂会议可能是14、15、16日一直开到18日，也可能中间有停顿，或者白天不开，晚上开。现在记不准确了。会议有汇报，有讨论，因为每天都发生许多新的情况。

7月18日下午，我参加了怀仁堂的会议（注：据《刘少奇年谱》下卷和《周恩来年谱》下卷记载，刘少奇主持的这次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7月19日举行的。）常委刘少奇、邓小平、总理等坐在前排，我们都坐在后排。开始是汇报会，少奇、小平要我们讲讲学校的情况。吴德汇报了大学情况，胡克实汇报了中学情况，我汇报总的情况，并在他们汇报时插话。陶鲁笏具体汇报了林学院的情况。陶鲁笏是大学委员会主任，大学委员会还是总理批准成立的。薄一波支持陶鲁笏的意见。陈毅在会上发表意见较多。支持我们看法的是多数，后来人家说，“

你们都讲话了”。谢富治没吭声。总理参加了1小时就走了，可能有外事活动。

胡克实的汇报通过了。吴德的汇报没有通过，还要改。

当时各大学都在酝酿赶走工作组。王光美在清华工作组，因此刘少奇了解的情况较多。他在会上讲得十分尖锐，批评中央文革一些人说：“照你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里有材料”。他的意思是，正常的做法是派工作组，工作组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党委不行了，由工作组代替。他是反对赶走工作组的。

这时，康生出来讲话：“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口气虽然和缓，但实际和少奇顶起来了。

康生刚讲完，陈伯达接着说。他的福建话我不能完全听懂，他讲的大意是批评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急风暴雨之中，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他的话等于把各地党委都打了，把责任放到刘邓的身上。小平站起来，叉着腰，十分气愤地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来。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你们去试试看！”

康生顶刘少奇，陈伯达和小平干起来，这真是冤家对头。

这个会议没有设专人记录。我坐在靠着记录席里面的一个沙发上。会议正开着，看见江青蹑手蹑脚进来了，在靠着记录席外边的沙发上坐下，把手里的包放在沙发上。她是偷着进来的，没有和主持会议的少奇打招呼。我心中一惊，想，她是不是从毛主席那来的，想提醒一下少奇同志，但是因离得太远，做不到。江青完全看到争吵的场面。我没有看到江青记录，她只是听。

当时少奇、小平非常激动，他们不会注意有人进来。

为什么叫“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初期的几个关键点上，他们看法一样，站在一起。

这种场合还轮不上我们发言。

就是这天，毛主席从武汉回到北京。后来宣布怀仁堂会议停止，这样的会议再没有召开。（注：据《刘少奇年谱》下卷和《周恩来年谱》下卷记载，7月22日召开了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刘少奇在讲话中再次表达了对工作组应当帮助教育，不同意赶走工作组的意见。）

五、毛主席回到北京

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少奇、小平根本不知道主席回来。主席一回到北京，康生、陈伯达、江青先去。少奇听到了就去了，走到门口，被挡了驾。少奇知道有事了。

24日晚8时半，毛主席在丰泽园召开会议。我和吴德都参加了。没有通知少奇、小平同志参加。据说少奇听到消息马上赶到丰泽园，看到外面停着很多车子，就没有往前走。另一种说法是，他走到门口，警卫不让他进去，只好回去了。

到会的各大区书记一看两位主帅没有来，知道情况有变，都比较紧张。我也不敢记录，是会后追记的。

开始让我汇报。我的话不多，刚说到“北京大学七个人的大字报，现在七个人有分裂”，毛主席插话：“分裂怕什么？世界万物都要有分裂！”碰了钉子，我就没有再往下讲。

毛主席讲：“没有反映，没有报告。”他的意思是批评少奇、小平封锁他。

康生讲：“我们的汇报也不多。”

主席说：“什么不多，没有！”主席对这些事都是亲自抓的。

陈伯达是否到会已记不清，因当时正在起草十六条。后来我从安徽回到北京后与吴德谈过两天，他记得参加的人还多。

主席说：“依靠工作组不行。教授，你们了解？工作组原来搞什么的，搞军、工、农。学校情况你们了解？”意思是工作组不行，确定要撤工作组。他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会议快结束时，陶铸请示：“主席是否找少奇、小平同志谈一下”。他于1966年6月到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少奇、小平都不在场，一个是副主席，一个是总书记，我们也觉得不合适。

主席说：“你谈，你去传达。”主席说话的口气表面上平和，实际上很重了。

散会后，我有事请示少奇同志，到他家里一看，陶铸也在，刚刚开始向少奇、小平传达。少奇让我坐下，参加他们的会。我忙说：“我有事，马上要去处理。”就出来了。

7月25日主席召集会议，仍然以工作组为主要议题，又和缓地讲了若干道理。

六、起草十六条

7月24、25日在主席那儿（丰泽园）开会时，中央正在起草十六条。主席让陶铸把文件起草好。陶铸主持，中央文革的人参加。

十六条最初的草稿是二十三条，到会者在讨论中将二十三条归纳为十六条。起草十六条开了好几次会。因为我不是起草小组的成员，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只参加过两次大会讨论。

各大区的书记都来了。他们到北京的时间有早有晚，参加会议的次数有多有少，他们都坐不稳。他们认为北京还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导，或有中央领导支持市里工作；他们远离中央，没有人替他们说话，没有回转余地。因此他们在会上讲话不多，大家都自顾不暇。

最早起草的二十三条上，有主席在杭州讲的“黑帮”、“保皇派”等名词，还下了定义。毛主席说这太长了，因而把这些名词都勾去了。改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

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在讨论“要文斗不用武斗”放在何处时，有人提出不要放在“批判时”之后，但是也没有反复推敲。最后写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关于“文革”与四清的联系，文件规定：“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重点。”乡村也应搞文化大革命，四清已搞完的，可以接着搞，四清没有完的，也可以接上搞，也可以搞完后再搞。后来9月14日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发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中说：“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规定学生“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收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这样使农村的运动压了一下。

七、中央文革小组到北大

7月25日下午，在北大历史系学习的我的女儿二林打电话问黄秘书（黄正在北大工作组办公室同张承先同志谈事）：学校里的大喇叭广播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到北大开会，听两派意见，问小黄是否知道。黄秘书完全不知道。张承先同志也不知道。我正在钓鱼台开会，也完全不知道。

我和吴德、陶鲁笳赶快开会商量，确定新市委赶快要人去。那时我们已知道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后，亲自做清华学生贺鹏飞（贺龙之子）的工作。

晚上，我和陶鲁笳赶到北京大学东操场。在会场边有个房子是室内体育馆。江青走到里屋，康生在外屋坐着，我就问他：“今天是开什么会？”康生说：“我也不知道。”

等一开会我就完全明白了，他讲的是假话。

我们进会场时经过一个月亮门，见到二林站在人群中，她向我打了一个招呼。当时北大对工作组发生很大的争论，二林和同学们在7月20日贴出大字报，提的口号是“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人家要挖这张大字报的黑后台，我没有和她多讲话。

各大区的书记也在主席台上就座。我坐在主席台上，听着江青、康生等人的讲话。江青主持会议。康生说：“我们是受毛主席的委托向大家问候。现在我介绍一下几位同志：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同志、刘志坚同志、王任重同志、张春桥同志，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他还介绍了几位大区书记，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曹轶欧（这位是他的“贤内助”）。

然后江青讲话，她说：“毛主席让我们做你们的小学生，就是说，做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同学，教职员，如果需要我来，我们召之即来。我们是革命的勤务员。革命的跟我们一块儿，不革命的走出去。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现在请你们来讲讲，给我们听听。”

随后康生讲话：“我们听说，同学们在若干问题上有各种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是正常的现象，真理通过辩论更清楚了。比如‘6.18’，有人说是反革命的事件，有人说是革命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是革命的，反革命的？还是既是不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对工作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

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不要听他那一套！你们别听那套！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你们的工作组是新的北京市委派来的。从6月1日到现在快两个月了，工作组怎么样？听说有各方面的意见，有的说是好的，有的讲有错误，有的讲有严重的路线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你们大家敞开讲，不要怕，什么都可以讲，不要有顾虑。有的说工作组在这里好，有的说不在这里好。文化大革命怎样搞？靠你们搞还是靠工作组‘包办’？文化大革命怎样做法？陆平、彭佩云又怎样斗法，翦伯赞、冯定之类的又怎样斗？怎么做法？可以辩论、研究。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他提了一连串的问题，倾向性十分明确，富有煽动性。

我没有讲话，坐在后排，低着头想事情。这时我的脑子完全乱了，气很大：这么大的会，文革小组亲自搞，谁给你们权力！我们是中央任命的。康生你这是做啥？！偷偷摸摸！工作组是我们派的？我感到这个人耍两面派。难道陈伯达带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也是北京市委派的？在北大，除了张承先工作组之外，实际上比这个工作组去得早的不也有一个曹轶欧的工作组吗？那又是谁派的呢？我也没有听清楚他们在会上再讲些什么。

学校两派辩论，“保”的意见多，保工作组的一派发言时，康生插话批评。下面递条子：“你们说民主，为什么插话压制我们？”康生说：“民主嘛！你们能讲，我们不能讲？！”

下雨了，会议没有开完就散了。

7月26日晚上接着开，仍是江青主持。

北大附中的一位同学讲话，她是反工作组的，她的口才很好，做了充分准备。保工作组的也有几位同学讲了话，但是讲得比较软。其他保工作组的都未上台发言。

陈伯达讲话说：“今天在会上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得很激烈，很尖锐，这是正常现象，是阶级斗争的规律。”然后宣布：“我们赞成大家的意见，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实际上工作组是压制同学革命的盖子，我们建议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我们很多同志受了一种旧社会的影响，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受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好像没工作组就不能革命。我们要破坏这个习惯势力。任何革命都不能由别人包办代替。”“第二个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师生代表会，这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这个小组成员、委员会成员、代表会代表，不能由人指定，而应由民主选举。”最后他说：“党的领导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党代表怎么才能代表党的领导？就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同学们说‘6.18’事件就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群众来斗争牛鬼蛇神的，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妥当的。”他借群众之口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

江青讲话装腔作势：“毛主席没有来。但是同学每张纸条，每个意见他都看。你们看，我这不是装了一包吗？”

中央文革小组的倾向引起保工作组的同学的不满，递条子：“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康生说：“有个同学递条子说‘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我们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的就不鼓掌嘛。为什么非要我们鼓掌呢？”

会开到11点，江青讲话，说到北大来了四趟。讲着讲着突然说：“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来了。特务搞到我家里来了。张少华在不在？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

，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她的母亲张文秋是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张少华她自己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她边说边哭。张少华的名字我第一次听说。据说张少华赶快离开了学校。

江青把干部子弟骂了一顿，然后又点了历史系的教师郝斌，说郝斌“坚决执行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行反攻倒算，围攻李讷（江的女儿）”；然后就批工作组，点了张承先、吴振声（教育部的干部）的名字。她说：“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就是张承先！这4年，我在文艺界工作，受了多少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我心脏也不好了。我也要控诉。”

最后康生做总结，他说，我们小组组长陈伯达已回答了昨天他提出的三个问题。他说：“我认为，张承先工作最大的错误有两个：第一，50天来，不是真正的教育同志们，使同志们认识到北大的文化革命要整个北大革命师生搞。这一点就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第二，50天来，北大整个学校连个文革委员会也没有组织起来，各系有的也是工作组代替进行的，不是真正放手发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你们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时，必须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们的一切事业都会前进，都会胜利。有的这样讲：你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就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他要大家学习“九评”。从那以后，50天的错误就成了一个定论。

在这个会上，中央文革小组宣布罢了张承先工作组组长的官。

我的脑子完全乱了，十分生气。宣布工作组犯了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错误，事先也不打个招呼，谁给你们的权力？！这是什么民主？！他们讲的话有些我也没有听见。

会快开完时，江青走近我问：“你讲不讲？”

我说：“我不讲。”我已很清楚，这样搞矛头是对着我们的。

江青又说：“你讲讲吧。”

我仍坚持：“我不讲了。”

江青转身回到主席台，冲着麦克风就说：“请新市委书记讲话”。她带头鼓掌。这毫无道理。

我完全没有准备，讲得很乱：“工作组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什么时候要让他们来，他们就来。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了解。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奉陪到底”这句话等于和文革小组对上了。他们记住这句话，并怀恨在心。3年多后的1970年在华北会议上和我算帐，又提出这句话。江青他们对“奉陪到底”之所以这样牢牢记住，其根源就是我在许多问题上同他们的看法有分歧，如支持不支持聂元梓的问题；派工作组的问题；要不要党的领导，依靠不依靠党团组织；该不该讲八项政策；斗不斗黑帮；该不该保留原北京市委的三位书记；对清华造反派蒯大富是支持还是镇压，等等。过了两天，7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学生大会上，江青接见一位北大学生时，怒气冲冲地说：“李雪峰算老几，我只要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把他捅倒！”果然过了十几天，8月16日我被罢了官。

7月27日，江青、康生带文革小组到北京师范大学。这次连听同学意见的形式也不要了。康生说：“首先，师范大学斗黑帮分子程今吾斗得好。我们经过调查，孙友余这个组长，没有把程今吾这个黑帮分子紧紧抓住，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我们同学。”他实际上宣布打倒孙友余。

江青讲得就更明确了：“工作组是石头，阻碍你们前进的道路。”她点了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名字，说他们在同学中制造分裂，号召同学们斗争他们。还说：“你们同学要求撤消工作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建议，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中央还没有宣布，她就向群众公开了。

康生在讲话中宣称彭真2月底3月初要搞政变，宣布为反工作组的谭厚兰平反。他说：“孙友余别有用心地说：‘林杰（北师大毕业生，中央文革工作人员）要整左派学生，林杰后头是关锋，关锋后头是陈伯达，关锋后头还有一条黑线’……我们是不是黑帮？是不是黑线？”

康生派关锋亲自抓林杰、谭厚兰。市委分工由吴德联系北师大。吴德讲话做事谨慎，康生认为吴德态度好些。后来吴德担任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在7月26日前后，具体日期已记不清了，地质学院要斗薄一波。吴德请示总理后，去了地质学院，为的是说服大家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一去就被人家包围了，成了笼中鸟。实际上人家早就准备好了。

当时大家都不清楚，少奇糊涂，小平也糊涂。小平见了我说：“苦了雪峰了。”少奇说：“批批也好，是个锻炼。”我心里真为他们担心。但我们见了面也不敢多讲话。

八、7月29日万人大会

因为中央文革到处宣布工作组犯了50天路线性错误，撤消工作组，这样中央不得不决定28日由新市委作出《关于撤消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中学）。29日，新市委在人大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这个决定，由我主持大会。

小平同志讲话，他说：“我以中央工作者的名义讲几句话。市委宣布从大中学校撤消工作组。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当时旧市委垮了，新市委工作人员少，各大中学校，革命学生和教师起来闹革命，纷纷要求新市委派人领导运动。新市委只好向各方面求援，学校工作组一种是新市委直接派出的；一种是在新市委要求下，中央各部门、河北省及“四清”工作组抽调的干部，临时集合起来，由新市委派出的；另一种是在市委要求下，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门派出的。”他否定了中央文革说工作组是新市委派的说法，承担了责任。

他说：“我们这个决定是比较匆促的。还有的决定，例如中学集训、军训等问题的决定也是比较匆促的。有的同志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而工作组到各校，又是非常仓促的，没有经过充份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市委工作的同志，自己搞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也没有经验，也没有在一些方面给工作组做具体的交待。工作组的同志按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去指导运动，有些不好的工作组还违背我们党历来对待群众运动的方针，自己搞一套，瞎指挥，乱闹一通；结果在一个多月中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学校甚至弄得很糟糕。这是个很大的教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基本的教训是，对于广大的革命师生的革命自觉性和创造性估计不足，对于革命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和革命本领

估计不足，对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路线方法，领导群众自我教育、自我锻炼、自我革命，从而推动和带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面实行广泛民主的伟大意义估计不足。”他认为：“工作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但是也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他们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左派和不同意见的人，严重地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把方向扭到错误的方面去，阻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引起广大师生对他们的不满，批评他们，以至要求撤换他们，这是完全合理的。工作组的大多数同志在主观上是想把事情搞好的。”他的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在北大的讲话调子显然不一样，口气和缓。他讲到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总理讲话中也说到工作组不是新市委派的。他说：“6月3日北京新市委成立，因此群众一方面敲锣打鼓庆贺，一方面要求派工作组。我们匆忙做出决定派工作组。对学校我们过去没有经验，特别是政府派去的工作组。很多工作组工作方式就是老一套，当然，小平同志刚才讲了，也有的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绝大多数工作组主观要求是好的，但方法不对，效果不好。”他说：工作组撤消后，留在学校，向你们学习。只要能认真检查，他们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你们会了解他们，他们也会了解你们。总理讲政策性的东西，讲要文斗。

最后少奇同志讲话，他说：“我也是党中央工作人员之一，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各学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党中央的总方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于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就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诚心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的工作人员，也是不知道，主要靠你们革，靠各学校的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践中来学会革命。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也不上课，干什么呢？干革命，你们干革命就是由你们闹！”“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他建议学生“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

会议刚开始，毛主席就到人大大会堂，在后台走来走去，一直在那听前台同志的发言。我递了一个条子告诉刘少奇，可是刘少奇正在讲话，比较激动，没有注意到。

翟英（李雪峰同志夫人——编者）她们当时坐在台下，听得比较清楚。听到刘少奇还讲了：“反对毛主席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少奇说：“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叫做‘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动的标语。一揍他，那么多人揍，公安部门只好暂时拘留，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拘留。如果你们暂时保护他的自由，让他活动，就放回来。不妨大局嘛。保护几个月再作结论。不论是对于黑帮，对于牛鬼蛇神，对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假左派等等，一般都要到后期来作结论。在作结论以前，暂时保护一下，让他活动一下，活动一个时候，我看没有坏处。”

翟英还注意听到邓小平讲：我们跟了毛主席几十年，难道现在就不跟了？

我当时主持会，十分紧张，有些话我都没有听清。

少奇讲完后，毛主席突然走上主席台，同群众见面。台下的群众掌声雷动，鼓掌长达10分钟。毛主席没有讲话。

“五十天路线错误”，我一直不清楚他们是如何算出来的。从6月3日到7月22日江青、陈伯达到北大活动，整整是50天。

∞ ∞ ∞ ∞ ∞ ∞ ∞ ∞ ∞ ∞ ∞

《炮打司令部》不是一张大字报

• 邱 时 •

1966年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于8月7日印发与会代表后，立即使这次全会笼罩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全会的议程改变了，由讨论通过《十六条》，转而成为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更引出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选。

一年以后，为了纪念《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社论认为发表《炮打司令部》这一天，“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日子”，“这张大字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进军的号角”。尽管我们对“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的社论有点“逆反心理”，但是，平心而论，对“大字报”所起作用的这些估价，并不是过份的。只是当时是宣扬它的伟大正确，而经过历史的沉淀，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它的严重失误。

发表这张石破天惊的“大字报”，确是“文革”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此，长期以来，对于这张“大字报”的发表情况，在报刊上屡有提及，并有不同说法，需要予以澄清。据查，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毛泽东用铅笔写在一张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报》上的。这一天的《北京日报》第一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字报”就是写在这篇社论的边角上，后面还注明日期：1966年8月5日。另有两页信纸，用毛笔誊清了毛泽东写在《北京日报》上的这段话。据了解情况的同志鉴别，毛笔字是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的字迹。在誊清稿上，毛泽东亲笔改动了几个字，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面注明的时间是1966年8月7日晨3时。当天，这张“大字报”就印发给与会代表。8月17日，作为“中发文件”下发，传达到县团级。经过红卫兵辗转传抄，《炮打司令部》迅速传遍全国。“炮打”、“炮轰”中央各党政部门和省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浪潮由此而起。

对于《炮打司令部》的主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出明确的结论。决议指出：“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历史事实表明，《炮打司令部》中对刘少奇等提出的三项指责，根本不能作为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论断的根据（详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75条）。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记得，那时有一张发行量很大的国画，就是以《炮打司令部》为题材。画面上是红太阳刚刚升起，散射着熹微的光芒，毛泽东手握毛笔，昂首站在临窗的写字台前，写字台上平放着一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艺术家凭灵感刻画人物，渲染环境，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在一些反映“文革”的纪实文学、历史专著中，也有类似情况。例如，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就写道：“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知“中南海大院”指的是什么地点）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修史以实为重，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不应掺以想像。附带说一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这本书中以想像描述历史，远不止此一处。

~~~~~

### 【亡灵祭坛】

文革受难者沙坪

• 王友琴 •

沙坪，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1966年8月22日在校中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位于北京西城区，在“白塔寺”附近。白塔寺有一巨大的白色圆形佛塔，很远就可看到。这个学校在文革中改名为北京159中学。

有人说，在北京所有被打死的中学老师和学校负责人中，沙坪可能是被打得最惨的。她在厕所里被打死。她被打死的时候，头发都被薅了下来，嘴里塞满了污秽物。后来她的尸体被放在一间小破屋里，红卫兵强迫其他在该校“劳改队”中的老师轮流进屋去“摸死人”。当时该校红卫兵以轻蔑和嘲笑的口气告诉外校的人说，有一个老师“吓得浑身哆嗦硬不敢进去。”

其实，别的学校被打死的老师，也是一样悲惨的。只是死者再也无法陈述事实，打手拒绝说出经过，以致人们很难知道其中的细节。但是，这些殴打和折磨的共同结果，都是永远不能挽回的死亡。

1966年8月，女三中的“文革委员会”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一共有十个教职工和4个学校负责人在“劳改队”中。除了14个在“劳改队”中的人之外，教职工被抄家、被毒打、被禁闭、被围攻的还有三四十人。这种校园“劳改队”，或者又被称作“牛鬼蛇神队”，是在1966年7月底最先在北京大学里建立起来的，后来，在全国的每一个学校都建立了。和所谓“牛棚”一样，校园“劳改队”是最普遍最邪恶的文革风景线之一。

在女三中，“劳改队”中的人被拘留在学校，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开始“劳改”，走路不许抬头，搬重东西必须跑步。体罚九十度大弯腰站立，可以长达六七个小时。有人跌倒了，就用铜头皮带抽。罚跪，还要把头低得接近地面，又不许头顶著地，有时还在大腿小腿之间压上大砖。有时让人跪著把木牌子衔在嘴里，有时要人跪在洗衣服用的有槽子的搓板上，跪得膝盖红肿出血。谁要是打盹，不是冷水浇头就是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猛打。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数十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第二天，也就是8月19日，傍晚，在女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室”（当时该校一共有三个这样的刑讯室。这是第一室。）里，红卫兵审问“劳改队”里的人：

“你恨不恨毛主席？”

“我不恨毛主席。”

“你他妈的是黑帮，你还能不恨毛主席？你不老实，非打死你不可。”

在这种审问中，被审问者回答“不恨毛主席”，被作为“不老实”而挨毒打，但如果回答“恨毛主席”，一定当时就被打死。红卫兵先用窄皮带抽人，又换成铜头宽皮带打。然后，又罚女“牛鬼蛇神”在院子里“跳台阶”。然后，又命令他们互相打，谁要是不肯打，就要被他们用铜头皮带加倍抽。他们用一只塑料鞋底，专门用来打脸，把人打得满脸青肿，口鼻流血，五官变形。抽打声，吼叫声，透过窗户传到外边的大街上，窗下停下了不少行人。

这样打到凌晨三点，他们又强迫“牛鬼蛇神”们跪在地上写“揭发材料”，谁要是不写，谁要是写不出，谁要是写得慢了一点，就拳打脚踢，或者用皮带抽打。

早晨五点，这些“牛鬼蛇神”们又被押去作繁重的劳动。

1966年8月20日上午，红卫兵在学校大礼堂前面召开全校“斗争大会”。“牛鬼蛇神”们已经被折磨了一夜，并且从前一天晚上起就没有吃饭。这时，他们被用绳子捆著，用嘴叼著“黑帮头子”“黑帮份子”“大右派份子”被赶赴“斗争大会”会场。还有一些“陪斗”者，被迫分别列队在会场两旁弯腰到地。在“斗争大会”主席台上，殴打了被斗者。被斗者自始至终被强迫取“喷气式飞机”姿势，低头弯腰，胳膊往后抬起，如果放下一点，就遭到木枪猛戳。

当两个“牛鬼蛇神”被打倒在地站不起来时，大会主持人大喊“不许他们捣乱会场，拉下去打。”于是几个打手把他们拉出会场，在他们的第二刑讯室里，用木枪、皮带猛抽猛打，然后又把他们拖进会场，跪在石子上，继续“斗争”。

“斗争大会”后，一些红卫兵又大声吼叫著，一路毒打，驱赶“牛鬼蛇神”在院子里爬行。然后，“牛鬼蛇神”们又被赶进“无产阶级专政室”，跪满了一地。红卫兵强迫他们头顶著地，用脚踏在他们背上，踩在他们头上。另外，又强迫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牛鬼蛇神嚎歌”。“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然后，又赶著他们爬出去，爬过校园，到学校西北角厕所里禁闭。

8月20日下午，又是几个小时的“斗争”和“劳改”。

晚上，“牛鬼蛇神”们被关在第三刑讯室里。他们被罚跪。监督“劳改队”的大队长叫他们跪著，两手扶地，两眼望天花板，不许合眼。谁要瞌睡，就用皮带套住脖子，用冷水浇或者用皮带打。

女三中只有女学生，有附近学校的男学生被叫来帮助打“牛鬼蛇神”。

沙坪是学校的最高负责人，被打得最重。经过三天三夜的殴打和折磨之后，1966年8月22日，沙坪被打死了。

同一时期，这个学校的数学老师张岩梅被抄家和殴打后，上吊自杀了。

在女三中校园里，红卫兵还抓来校外一个司机的妻子，七个孩子的母亲，说她是“女流氓”。红卫兵把她打死以后，还强迫“劳改队”里的人轮流打尸体的脸。然后，又把“劳改队”中的人也拖上运尸体去火葬场的卡车。卡车开到“西四”（北京的闹市之一）时，命令他们下车，用木枪押著他们在那里“游街”。

1966年8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时期，在北京的中学里流行著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儿吗。”这句话最早就是从女三中流传出来的。这句话包含著杀人者的轻狂自大和对被害者生命的极度轻蔑。28块是当时火葬一具尸体的价钱。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费用要由他们的家属支付，但是不准保留骨灰。

沙坪所遭受的，在北京的其他学校同样发生。一批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或者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从笔者所作的一项对115所学校的调查结果得知，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被迫害致死的中小学教职员，已知日期的有：

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

17日，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被打死。

19日，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语文老师张辅仁和总务处职员张福臻被打死。

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血流遍地。

22日，在沙坪被打死的同一天，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也在校中被殴打折磨而死。

25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老师靳正宇、学校负责人姜培良在校内被打死。

26日，清华大学附中26岁的物理老师刘树华在红卫兵召开的“斗争会”上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校长高万春被五花大绑押到“斗争会”上遭到毒打后自杀。

27日，在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

9月8日，北京第52中学语文老师郑兆南被关押殴打折磨数十天后于死亡，时年36岁。之前，副校长易光轸被毒打后自杀。同日，北京第25中学的语文老师陈沅芷被打死。

10月1日，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邱庆玉被打死。

10月3日，北京第六中学的退休老校工徐霈田在校中被打死。

从调查已知的在1966年夏天被打死的北京的教育工作者还有：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老师喻瑞芬，景山学校校工李锦坡，北京第25中学的一位校工，北京第138中学姓张的负责人，北京女四中的一位教语文的女老师，都在这一时期被打死。他们的确切死日和全名，还有待继续调查。

从调查已知的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还有：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跳楼自杀。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汪含英，被剃了“阴阳头”和抄家后，和她的丈夫苏庭伍，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数学教师，一起在北京郊区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宗投湖自杀。李培英，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得浑身血肉模糊，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关押，自杀。萧静，北京月坛中学校长，跳烟囱自杀。北京第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自杀。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自杀，英语老师投水自杀未死。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白京武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赵谦光，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赵香衡，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跳楼自杀。他们的确切死日尚有待于继续调查。

沙坪的好友沙立，是第51中学的负责人，虽然未被打死，也被严重打伤。

早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就打死了校长卞仲耘。卞仲耘是北京在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从卞仲耘的死到沙坪的死，已经有17天。卞仲耘被打死的消息在8月5日立刻被报告给高层。但是没有人来制止天天发生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相反，文革当局绝对控制的报纸和广播每一天热情报导和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文革的“首长”们在各种集会上对红卫兵高度赞扬。在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之后，暴力行为进一步升级。沙坪就被杀害于这一暴力迫害和杀戮的高峰期间。

在沙坪被打死之前和之后，大规模进行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残酷殴打和杀戮，在北京持续了整整两个月。事实上，不但在中小学，大学的教育工作者们也受到暴力攻击。另外，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教育工作者都受到了类似北京的迫害。

沙坪死后，“劳改队”中的其他老师仍然关在学校中继续被打被侮辱被折磨。沙坪是第三女子中学的第一负责人。这个学校有一位副校长董光苔。她在5月刚生



了孩子，还没有满月就被拉到学校“批判”，然后又在“劳改队”中受到残酷的暴力虐待。董光苔的父亲叫董振堂，1931年从国民党的军队投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的军团长，是共产党军队的重要人物。1937年1月董振堂在甘肃高台战死。董振堂死后被尊为“革命烈士”，他的妻子即董光苔的母亲一直受到优待。董母听说校长沙坪已经被打死，女儿被关在学校“劳改队”中不能回家，她深恐下一个被打死的就会是她的女儿。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女儿的处境，请求救助。她通过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关系，把这封信递了上去。由于这种特殊关系，毛泽东收到了此信，并对此信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批示没有发给董光苔看过，只是通过解放军军人来学校传达给红卫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记得的内容是：“此人如无大罪恶，可以放出来。”因为得到这个批示，董光苔就被从“劳改队”里释放出去，在当时算是极大的幸运。她安全活了下来。但是，三十年后，她和笔者谈到毛泽东“如无大罪恶”的话，她还是感到很不舒服。她说，她跟“大罪恶”有什么关系呢？

董光苔出了“劳改队”，可是女三中别的老师还在其中。其他学校的大批老师也仍然在“劳改队”中。在“劳改队”中的人，随时可能遭到打骂侮辱甚至杀害。他们又有什么“大罪恶”呢？就是有“罪恶”，也应该由司法部门来审理，而不是由学生红卫兵用如此残酷的方式处置。可是，没有人来给他们任何帮助，没有人为他们说一句话。

1966年9月13日，女三中的“文革委员会”又把“劳改队”分成“劳改一队”和“劳改二队”。这标志着这种校园“劳改队”变得更为体系化和权威化。“劳改二队”中的教职员在“劳改队”中长达四个多月，受了无数折磨。“劳改一队”中的人则受到更长时间、更严重的摧残。

董光苔由于毛泽东批示而离开“劳改队”的故事显示，文革的最高领导人知晓当时发生的种种残酷，而且始终控制着这种残酷的程度和范围。没有理由说他们“不知情”或者以“群众运动失控”来为他们辩护。当时有不止一个情报部门每日向上报告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数字。文革领导人一再热烈支持红卫兵的行动，这说明，种种残酷的暴行，正是他们所要的。

应该说明，1966年8月，当红卫兵在北京进行大规模抄家殴打以至杀戮的时候，文革的最高领导人是“保”了一些人的。从现有资料看，北京的教育工作者中，董光苔是唯一被“保”出“劳改队”的人。另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8月30日写了一份他要给予保护的人的名单。其中第一个是孙中山夫人、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这一名单发表于1984年出版的《周恩来文集》第450页。全文照录如下：

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     |     |     |     |     |
|-----|-----|-----|-----|-----|
| 宋庆龄 | 郭沫若 | 章士钊 | 程潜  | 何香凝 |
| 傅作义 | 张治中 | 邵力子 | 蒋光鼐 | 蔡廷锴 |
| 沙千里 | 张奚若 |     |     |     |

- (1)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 (2) 部长、副部长
- (3) 政副
- (4) 国副
- (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 (6) 两高
- (李宗仁)

很容易看出，这张名单上的人，地位都远远高于象沙坪这样的中学校长。名单

上的这些人得到了保护，他们没有被打或者打死。至于北京的普通教育工作者们，除了董光苔一人，都不被保护。北京有巨大的人口，当8月下旬抄家、殴打和杀戮大规模展开，每天有数百人被活活打死的时候，由最高层当权者下令保护数字很少的一些人，显然也意味著宣告这数字之外的其他人不被保护。

最高权力当局一方面对红卫兵赞扬和鼓励，一方面对只有数百人宣布“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沙坪这样一个中学校长必然难以逃脱被打死的悲惨命运。沙坪等一批人被如此残酷地打死，而且，只被当成“28块钱的事儿”，也就是说，只被当作无足轻重的小事。1966年8月到10月，北京有数千名教育工作者与和平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打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超负荷作业，尸体依然积压。尸体从各处运来，衣衫破烂，血肉模糊。火葬场在尸体堆上加上大量冰块，场景和气味极其可怕。

在北京这样一个有三千年历史的文明古都，发动组织大中小学的红卫兵学生杀害教师和居民，制造了这场杀戮的文革领导人们，才真正有“大罪恶”。

然而，三十年来，“罪恶”一词还从未被用在1966年夏天的这一场杀戮上。

1966年的暴力迫害只是文革的一部份。1968年初，“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的迫害。在沙坪的学校中，两位教师，方婷芝和孙历生，被“隔离审查”在学校中时自杀了。当时所谓“隔离审查”，是指把被“审查”的人，关押在工作单位自设的牢房里，不准自由行动，不准会见亲人朋友，不断遭到审问甚至刑讯，“隔离”的时间可以长达数月甚至几年。与1966年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暴力虐待更多地是在关起来的门背后进行，也更加有组织有系统，1966年时则常常在群众集会上大张旗鼓地打人和打死人。

就这样，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文革的前三年，有一位校长被打死，三位教师受到暴力迫害后自杀，一共有四个人丧失了生命。

方婷芝老师教化学。她被关押的时候，一天中午被准许出学校上街买药，她撞死在疾驰的汽车上。孙历生老师在1957年被划成所谓“右派份子”，后来“摘”了“帽子”，在文革中又受到攻击和折磨。她上吊自杀。

一个在五十年代上过孙历生课的学生说，孙历生老师是一个外形和气质都很美的人，后来成为作家王蒙在八十年代初所写的小说《蝴蝶》中的一个原型的。那个人物有和孙历生相似的经历：一个参加了共产党革命的年轻的知识女性，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和丈夫离了婚，在文革中自杀了。小说描写了那个人物的单纯和善良，但是对那个人物的死只是含糊地提了一下。小说当然属于虚构文学，作者可以编排自己喜欢的情节。问题在于，在文革中这样的众多的死亡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然而，沙坪、张岩梅、孙历生、方婷芝和其他老师在文革中的死亡，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被允许清楚地记录下来或报告出来。于是，孙历生、沙坪们的死亡，以及这种死亡的异乎寻常的恐怖性，被掩盖被忘却了。在王蒙同时期发表的另一小说《布礼》中写道，共产党象是母亲，母亲有时会错打了孩子，但是孩子决不记恨母亲。这一比喻也多次出现在当时的官方报纸上。这一比喻被官方用来解释和定性文革中普通人身受的迫害，并指示普通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身受的迫害。这是一个什么文学化的比喻？孙历生和沙坪们的惨死，以及北京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可以作如是比喻吗？这个比喻意味著对生命的轻蔑还是对权力的迷狂？

文革后，1979年，北京市教育局曾经调查沙坪之死。由于胡耀邦关于对文

革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意思是只给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的指示，这个调查进行了一半就不能进行了。参与打死沙坪的人住在北京的军队“大院”里。去调查的老师在“大院”的大门外被挡住了。不准他们进门。

□ 写于二〇〇〇年八月

∞ ∞ ∞ ∞ ∞ ∞ ∞ ∞ ∞ ∞

忠烈失骨骸，张志新魂归何处

• 郑兢业 •

岁月之河把中国的许多人和事都淹没了，但张志新的名字除外。很多人一直没有忘记，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势力，绝大多数人怯懦地保持沉默，而上有老母、下有儿女的张志新却拍案而起斥责当局，因而惨遭杀害。处决张志新时，由于担心她呼喊口号，监狱当局切除她的喉管，而且动刀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

张志新冤案公开后，举国震惊。可是，二十多年来，张志新冤案的不少真相仍被隐瞒，烈士的骨灰盒至今空著，遗骨依然下落不明。难道空著的仅仅是骨灰盒？不，“空”著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良知，“下落不明”的是人们的历史责任感。我不相信烈士的遗骨会真的下落不明，反正我不相信。我也不相信，一个由辽宁省委直接下达死刑令的政治犯的尸体，会像一片树叶那样飞舞在深渊般的黑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既然遗骨都能成为“悬案”，我为甚么不可以这样推断：有关烈士遗骨的下落，是否还有比切除喉管更可怕、更没人性的内情？又是为了保全甚么形像，才死死捂住秘密真相？

在那个黑暗的历史年代，我也因“反动言论罪”被判重刑。出狱二十年来，我极少对人谈及本人蹲过的监狱，就是割断张志新喉管的那个“模范”监狱——沈阳监狱。当然，我不可能亲眼看到张志新被刽子手绑赴刑场的那惨烈一幕，但我毕竟和难友在宣判她死刑的地方——第四大队监狱的篮球场上，为冤魂洒下悲愤眼泪。这桩旷世奇冤火烙刀刻般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却一直保持沉默，因为那里尽管是我精神回炉、信念重铸之地，同时也是我丧尽尊严、心灵破碎、膝盖软化、脊梁弯曲的地方。

然而，在今天的平庸年代，我决定打破保持了二十年的沉默，披露张志新烈士获平反后鲜为人知的“人间闹剧”。七九年春，《辽宁日报》刊出有关张志新冤案的长篇通讯，题为《为真理而献身》，她成了“人民英雄”。于是，张志新的英名与沈阳监狱的恶名难解难分。人们看清了，是沈阳监狱“造就”了张志新。如果没有割喉管的“创举”，张志新或许不会举世闻名呢。在全国媒体歌颂宣传张志新的时候，沈阳监狱也不甘“落后”。从狱警到囚犯个个称道张志新的高洁品格，讲述她在狱中的表现，也品尝“时髦”的滋味，却忘了大家曾经折磨、凌辱和批判过这个高贵的女囚。

一九七九年六月的一个上午，监狱当局特别开恩，把全队犯人提出监舍，带到曾宣判张志新死刑的那个操场上。因为天热，愿意剧烈运动的犯人不，管教队长领著五个囚犯打半场篮球，其余犯人在树荫下聊天和打盹。我和一个李姓资深狱友谈起张志新。说著，他身不由己站起来，把我领到张志新听宣判时站立过的地方。他用脚尖点了点地面，低沉地对我说：“就在这里，张志新的最后足迹就留在这里。宣判一结束，几个如狼似虎的家伙扑过去，把张志新压倒在地，有人抓胳膊，有人抓脚踝，将她在空中来回甩了几圈，再像装卸工掀麻袋那样，先把张志新抛起，再让她摊手摊脚地重重跌落在卡车底板上……”

站在烈士最后的足迹前面，在揪心扯肺般的痛楚中，我把目光从血腥的土地移向历史的深处。同样是政治犯，同样是死刑，同样是共产党人，同样是走向刑场，陈铁军和周文雍在国民党的屠刀下，还可以举行刑场上的婚礼，还能留下震撼历史长空的声音：“让反动派的枪声作我们新婚的礼炮吧！”可是，我们的张志新，在称为“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行刑前却被切除喉管，连喊一声“祖国万岁”都不许可！有人会说枪杀人民的优秀女儿张志新的时候是文化革命非常岁月，但我仍想问一问，当时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

我和姓李的狱友怀著铅一般沉重的心情回到操场上，在水泥长凳上并肩坐下，他又说了令我极其感动的話。他满脸愧色对我忏悔：宣判张志新死刑后，监狱当局在囚犯中掀起批判张志新的运动，每个犯人都必须写诋毁张志新的批判稿，“要以张志新这个反面教员为训，决不走反改造的毁灭之路”。李姓狱友说，一个识字甚少的狱友为表明“批判立场”，请他代笔写批判稿。“于是我写了一页痛骂张志新的话”，换来狱友省下的半个馒头。“今天回想起来，真是羞愧得恨不能找一条地缝钻进去，不再见人”。为自己奉命而作的批判稿羞愧得无地自容，而监狱当局该怎样面对自身的尴尬呢？其实，沈阳监狱只要作出像样一些的忏悔，也可以得到群众的理解，可是监狱当局拒绝的正是忏悔。为了掩盖过去的劣迹，监狱当局频频举行赞颂张志新的“赛诗会”。黑板报、玻璃橱窗宣传栏、各办公室的学习园地、党员园地，一窝蜂地变成了滑稽的“赛诗台”。

我至今都清晰记得一些“诗句”，不是因为精采，而是因为太荒唐、太怪异：“颂张志新——你是党的骄傲，你是五十六个民族的骄傲，你是辽浑大地的骄傲，你当然也是沈阳监狱的骄傲。你是傲霜的菊，你是斗雪的梅，你是常青的松，你是有气节的竹。你是刘胡兰，你是秋瑾，你是双枪老太婆（著名长篇小说《红岩》中的游击队长），你是江竹筠（国民党重庆监狱中的女共产党员），你是哥白尼……”“……党的好女儿张志新的成长升华，是毛泽东劳改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等等。

我想到了德国人民和他们二战后的历届政府，他们不像我们把文革十年的种种罪恶都算到林彪、四人帮头上，其余的人都是“无辜者”。德国人把希特勒犯下的罪恶视为日尔曼民族的集体罪恶。这个勇于反省、懂得忏悔的民族，半个多世纪来一直设专门档案，向散布于世界各个角落的纳粹集中营幸存者支付数目可观的赔款，寄忏悔书、慰问信和圣诞礼物。如果德国人民以沈阳监狱为榜样，不就可以省去忏悔和赔款？歌德的子孙也可发挥诗歌特长，歌颂集中营幸存者的顽强，也为集中营“造就”了那些顽强生命而骄傲，岂不万事大吉也暴得大名，两全其美？

好在中国民众没忘张志新。作家白桦七九年就写下了卓越的诗句，一直在民间流传：

历史老人真是一个大手笔，  
在死神面前绘出了生命的异彩；  
志新！我们整整一代人的长姐，  
你无声的呐喊惊醒的何止是一代？  
……

可悲呀！至今还有人自愿留在奴隶状态之中，  
还在向杀害亲人的刀斧顶礼膜拜；  
如果霹雳当顶还要昏昏沉睡，  
那只好请他们和冥冥之中的鬼神同在。

□ 作者为河南郑州市专业作家  
~~~~~

【研究动态】

在美国听“文化大革命”课

• 李向前 •

甫到哈佛，正是新学期的开始。各类课程、讲座的告示，贴满了校园。学生们背着书包，夹着厚厚的课本、讲义，个个行色匆匆。整个气氛既紧张又有条不紊。当然在这份忙景色中最能吸引我注意的，还是哈佛怎样进行有关当代中国的课程。事有凑巧，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的“文化大革命”课在1月底正式开讲。于是，我这个“陌生客”便也跻身于急匆匆的行列之中。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文化大革命”课竟如此风靡哈佛，吸引了众多的学生，以致原由校方安排的教室因实在拥挤不堪而连续更换新址。

据统计，今年（一九九七年——编者）选修“文化大革命”课的学生共计370人，分为27个班。校方仅助教就请了10名（按美国的上课方法，教授一周授课两次，每次一小时，然后即分班讨论，助教再在小班上提供进一步的辅导）。在以提倡文化多元、学术自由和分散管理为标榜的哈佛，出现这样规模的“大课”，是近年来少见的。关于这其中的原因，以及它同当今美国社会某些变化着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我将在下文略作分析。

“文化大革命”课是作为“外国文化”类的课程提供给学生的，对可能相当多的哈佛本科生而言，“外国文化”是一门必修课，也就是学校所说的“核心”课程。这即是说，不管专攻理科还是有意在文科方面发展的学生，都要有“外国文化”课的学分。据说，哈佛管理层有这样的看法：哈佛的学生不仅要熟习本国文化，更要对外国文化有所认识。显然，这样做是颇有眼光的。

但是在我看来，要从纯文化的意义上理解，“文化大革命”课更像一门历史课程。因为它的主题是叙述已经过去20余年的中国的一场政治运动。而其考查的对象和研究的方法，也都是以历史事件间的相互联系与发展为目标。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它同国内“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已相对固定的布局有着很一致的地方。那么，哈佛为什么要把它当作“外国文化”类的课开出来，而且吸引了众多的学生，是很耐人寻味的。

下面是“文化大革命”课程的授课提纲。连同概论共分为6个部份23讲，现抄录于此：

1. “文化大革命”概论

第一部份：中国革命的起源

2. 帝国统治秩序的崩溃，1836—1916

3.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1917—1949

第二部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4. 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稳固，1949—1965

5. 道路分歧

第三部份：第一次排炮

6. 批斗“三家村”

7. “炮打司令部”

8. 毛征服了首都

第四部份：红卫兵的兴衰

9. 校园革命的迸发

10. “一月革命”和“二月逆流”

11. 毛对战友的清洗

- 1 2. 反作用力：武汉事件
- 1 3. 红卫兵的上山下乡
- 第五部份：波拿巴主义的幽灵
- 1 4. 林彪的神化
- 1 5. 打开对美国的大门
- 1 6. 林彪的失势与败落
- 第六部份：争取毛泽东接班人的斗争
- 1 7. “四人帮”的兴起
- 1 8. 邓小平复出
- 1 9. 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威胁
- 2 0. 周恩来之死与天安门事件
- 2 1. 毛泽东的去世与清洗“四人帮”
- 2 2. 不堪回首
- 2 3. “文化大革命”的遗产

关于这门要持续3个多月的课程的宗旨，麦克法夸尔教授作了如此的概括：它将对中国历史决议中这样一个结论，即：“从1966年至1976年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它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和发动的”进行验证并试图接近于真实。

为了使绝大多数从来没有听过有关中国课程的学生，易于理解中国六七十代发生的一切，主讲人显然认为，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对19世纪以来中国面对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所做出的反应，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共最终夺取政权和至1966年以前的中国国内政治状况作一交待是必要的。这就是我们在提纲中看到的前四讲内容。

在进入“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分析时，麦克法夸尔教授事实上要向学生交待下面的几个重要观点：首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应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6年至1969年，是摧毁旧的政治精英与红卫兵运动兴起与衰落的时期；第二阶段1969年至1971年，事实上是以林彪集团占支配地位为主要特征；第三阶段1972年至1976年，则表现为由谁来继承毛泽东的斗争。其次，麦克法夸尔教授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过程，表现为两个层面的发展。一方面，毛泽东首先打倒彭、罗、陆、杨，继之废黜了刘、邓，这是以上层政治斗争的形式来实现的。另一方面，以红卫兵为主的群众运动被发动起来，用以摧毁党的基层组织和结构。麦克法夸尔教授认为，这种以无约束的社会来破坏国家结构的事情，在共产党国家中是没有先例的。在苏联，斯大林也只是用国家机器的一个部份来攻击和削弱另一部份。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引发整个社会的动乱和斗争。这种斗争的长时期结果，就是党在国家中的权威遭到破坏。于是，又造成了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重大的政治后果，就是以林彪为首的一批军人地位得到抬升，并最终威胁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再进行反对林彪的斗争。

麦克法夸尔教授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泽东希望那些同他一起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这是主要指江青、张春桥等），能将这场革命的精神和他的思想遗产保持下去，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四人帮”的垮台和毛泽东试验的终结。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最终的接班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无缘在偌大的课堂上对“文化大革命”课程评论什么。但是，当我看到几百名年轻的大学生，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发生在遥远中国的一段往事，并或多或少并不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难以把握六七十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背景之下，从而引发了中国社会的一场动乱这样关

键之处的时候，是有着相当的遗憾的。特别是当课堂上放映关于红卫兵造反与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状态的电影纪录片时，我是很不自在的，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年代。

然而从哈佛大学授课的标准看，“文化大革命”课是相当成功的。麦克法夸尔教授用语生动、善于表达，使学生们十分专注。这使我想起最近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看到的一些情况：凡是有关中国政治、经济以及东亚、环太平洋地区的课程、研讨会，都是场面热烈，听者多多。其中的原因可以说不难理解。就在不久前，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纽约时报》1996年10月6日的一篇报导公布了一个有趣的调查结果：“据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对美国2772所高校学生选修外语的人数进行的统计，在1990年—1995年5年时间里，美国大学生中选修中文的人数，增加了36%。中文成为美国大学中排名第6位的最热门语言。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调查者没有正面回答，但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执行主席说了下面一段话：“学生在选择自己研习的外语方面，通常变动很大，但这种变动总是反映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向。”我想，此论诚为有见地之言。中国近年的发展令人瞩目，而这意味着众多的机会和巨大的市场。如果说，中国正以自己的进步走向世界，那么世界也必然会越来越关注中国。“文化大革命”课再度在哈佛（1988年麦克法夸尔教授第一次在哈佛讲“文化大革命”课，有700余人听讲）走红，未始不是令我们自己发奋和激励的契机。

□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荣刚（美国）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吕青（加拿大）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波（美国）	<cnd-cm@cnd.org>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HZ或GB—UU编码版）以及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服务站地址：[ftp.cnd.org\[206.135.33.5\]:pub/hxwz](ftp.cnd.org[206.135.33.5]:pub/hxwz)
